合作安全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宫玉涛[1], 赵丽[2]

（1.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室，北京 100720）

［摘要］ 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进程中，要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需要选择正确的安全理念。相对于集体安全等传统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安全理念。中国选择合作安全理念，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必然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维护我国安全利益的最优化选择。

［关键词］ 合作安全；中国；安全利益；外交战略；国际安全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2-0058-06

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合作安全理念，[1](P.67) 正在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作为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对外安全理念在不断探索之中。运用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指导我国的对外行为，关系到能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安全环境，关系到中国安全利益的维护程度。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对外行为以合作安全理念为指导，有助于为我国和平发展创造一个相对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有助于更大程度地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

一、合作安全的“理念优势”

自古而今，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安全理念。近代以来，集体安全、均势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安全理念在不同时期“各领风骚”，为不同的国家所推崇和实践。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段，这些安全理念也并非孤立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画了国际安全理念的“完整图案”。

在当代，相对于集体安全、均势安全、共同安全等传统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有其“理念优势”。合作安全是在对传统安全理念的弊端和局限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传统安全理念的超越，同时又兼容了传统安全理念中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集体安全、均势安全、共同安全的提出和实践均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适合特定国家和国际形势而形成和发展的。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时代潮流、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集体安全、均势安全、共同安全等传统安全理念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基本不复存在，

* 本文为北京市“十一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与现实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6AaKD0008）、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中国和平发展的“合作安全”战略研究》（项目编号：0910KYQN22）的阶段性成果。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些传统安全理念逐步“落伍”，弊端和局限逐渐突出。对我国而言，这些传统安全理念的弊端和局限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和面临的国际形势，与那些历史上实践传统安全理念的国家有较大甚至本质的差别，我国应该也有必要选择不同于它们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理念虽然出现的较晚，但却是适应时代潮流、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适时性。

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均势安全等传统安全理念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较大区别。[2](P.91-98)例如，这些安全理念的最根本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而实现该目标的途径却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集体安全强调，通过构建并依靠强大的集体力量，维护安全利益。集体安全理论认为，其“提供了为法律义务所支持的确定性：任何侵略者都会面临集体的制裁”。[3](P.42)均势安全强调，通过实现彼此实力均衡而能够相互制约来维护安全利益，“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平”。[4](P.36)共同安全强调，通过与敌国合作而不是削弱敌国来维护安全利益，“安全只可能与敌国共同获得，而不可能靠削弱敌国的安全来获得”。[5](P.7)合作安全则强调通过平等的、渐进的、多渠道的合作、磋商而非武力的手段实现安全利益，“军事力量的使用将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在其他所有的有影响或强制性手段失去作用的情况下才会被激活”。[6](P.16)

合作安全不是完全反对、否定传统安全理念，而是在反思、超越的同时借鉴、兼容了传统安全理念的合理内核。以集体安全为例，其一些合理内核就为合作安全所兼容。“一个成熟的合作安全框架应该包含集体安全的一些规定，可以看作是对其参与主体一旦遭受外敌入侵的辅助性保证”。[7](P.362)如集体安全所具备的约束力和制裁力，可以无形中对入侵者形成强大压力。

总体而言，合作安全是对集体安全、均势安全、共同安全等传统安全理念的超越式发展，同时兼容了它们的一些合理内核，因而更具生机活力，更能适应冷战结束后时代潮流、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通过合作安全，“建立合作性的世界秩序，是比均势、集体安全等更为可取和有效的维护国际和平的途径。”[8](P.14)尽管合作安全有不少缺憾，如对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应变力不强，对参与主体的约束力较弱，以及由于参与主体合作诚意度的不完全一致性而影响合作的力度等，但相比较于传统安全理念，合作安全的“理念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它更符合当今国际安全形势的现实，更具有可操作性。

对我国而言，合作安全是更符合我国基本国情、面临的国际形势和现实需要的安全理念，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实现我国安全利益的最优选择。合作安全的这种“理念优势”是中国选择合作安全的基本原因。

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我国选择合作安全理念提供了有利的时代背景，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则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战争与革命是当时世界的基本特征。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战争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给人类造成了空前浩劫。与此同时，战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又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建立起来，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实现了独立。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均具备了世界性意义。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东西方进入了冷战状态，这也是和平与发展的能量积聚的时期，是战争与革命逐步向和平与发展过渡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基本已经从整体上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一是，和平的力量已大大增强，并将继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是世界上基本的和平支撑力量，这支力量拥有130多个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4，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增强。而且这支力量正在迅速而不断地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重大而独特的作用。同时,西方国家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开展，一些有传统侵略意识的国家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在降低，西方国家内部反战力量在不断增长，这些都成为和平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全球化的反战组织和反战行为，其对世界战争力量的制约在增强。二是，大国间基本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均衡状态，有利于世界整体的和平与发展。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和维护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可以发动针对个别“小国”的战争，典型的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美国的每次战争行为都会受到大国（包括法、德等美国的部分盟国）不同程度的制约。在全球范围内，俄罗斯仍然是在军事上制约美国的主要力量，中国等大国在区域范围内对美国形成了强大制约。整体而言，各大国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均衡状态，特别是一些大国之间事实上的“核恐怖均衡”，在主客观上都会对一些国家的战争意识形成制约，从而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也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将增进中国与他国的交流、交往，增强中国与他国的互信、互利，缓解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的隔阂和“安全困境”，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作用力，增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能力和信心，从而使中国成为真正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之一。

三、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

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为中国选择合作安全理念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则有利于塑造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在不断改善，总体呈现出日益趋好的态势。整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政策，逐步走出了与西方对抗、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僵化的局面。我国同发达国家关系稳步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更加巩固。与此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应对国际“敌对行为”的能力逐步提高。无庸置疑，中国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国际安全环境之中。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采取合作手段解决安全问题，实现自身安全利益共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同时，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则将有利于塑造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作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崛起将对地区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中国崛起威胁论”的消极影响，可以通过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而逐步缓解乃至消释。合作安全理念的实践可以增强中国与那些对我国有“敌对意识”国家在安全利益方面的交叉性，促使中国与他国围绕安全利益的博弈更多的是“共赢博弈”而非“零和博弈”。例如，中国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韩国等周边国家之间通过合作有助于进一步增进彼此的互信，减少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对抗性。与此同时，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将促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地区和国际责任，在一些重大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促使这些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朝鲜核问题就是典型事例。这些都将有利于塑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全球性安全问题

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安全问题是中国选择合作安全理念的压力和动力，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则将推动各类全球性安全问题的解决。

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理想化的国际安全环境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面临不同的安全困境问题。“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9]（P.46）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的特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的全球性安全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日益发达的通讯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广的范围渗透，不知不觉且迅速地改变着世界，影响着世人。全球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加快了高新技术的全球性扩散和推广，加速了资金、人力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拉近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使各国的利益在更大范围内交互、融合。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导致恐怖主义、核扩散、跨国犯罪等安全问题的全球化扩散。这些安全问题虽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都与以往不同。面对各类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挑战，如何有效应对它们成为各国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利益，需要各国通过协商、合作共同去解决。随着中国安全利益的全球扩散，各类全球性安全问题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影响在不断增大。要应对这些全球性安全问题，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显然是不行的，需要中国加强与他国的合作，这也会为中国选择合作安全理念提供压力和动力。

反过来，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则有助于各类全球性安全问题的解决。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全球性问题均非某一个或者几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需要全球性合作。而一些具有较强复杂性的全球性安全问题也很难通过快速的方式、单一渠道得到解决，这就需要动员相关国家通过渐进的方式、多样的渠道进行解决。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倡导通过和平的手段、渐进的方式、多样的渠道来解决各类全球性安全问题，这对于解决各类全球性安全问题是有利的，也是有必要的。中国应通过自身的努力促进各类全球性安全问题，特别是那些关系中国安全利益的全球性安全问题的解决。

五、改革开放的需要

改革开放为我国选择合作安全理念提供了内部推动力，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则将推动改革开放向深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行，中国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历程。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改革开放的推行强化了国人的合作意识，使得中国政府选择合作安全理念具备了夯实的民意基础。要维护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求我们选择一个最优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理念无疑是当前的最优化选择，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面临的国际形势，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容易为国人接受和认可。

反过来，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则将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一方面，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将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这对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是必要的。改革开放要深入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没有这样的外部环境，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势必受到影响，这也必将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将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从思想意识上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创造条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六、外交战略的发展

外交战略的发展是中国选择合作安全理念的主观条件，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则将推动外交战略能够适时调整。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外交战略几经变更。建国初期，在“雅尔塔体系”已经大致形成、美苏两极冷战对抗的局面已经出现的大环境下，中国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而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0](P.93)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政府调整了外交战略，即由“一边倒”外交战略发展为“两个拳头打人”的“双反”外交战略，即既反帝国主义，又反修正主义。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苏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方向发展，美国不断向中国发出和解信息，而中国自身也深深感受到来自苏联的强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并实践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即从中国出发，经过日本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再经过中东到欧洲，最后到美国，这是“一条线”，其周围的国家是“一大片”。改革开放前的外交战略，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集体性”的结盟或战略性结盟。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外交战略适时进行了调整，即提出并实践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11](P.162) 随着外交战略的转化，中国加强了“走出去”的步伐，发展全方位的外交，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同各国平等交往，合作解决双边或多边问题。中国政府确立的这一外交战略与合作安全倡导的核心原则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为中国选择合作安全理念提供了主观条件。

反过来，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则将推动中国外交战略的适时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指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某些环节或细节的调整，而非整体性的调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是我国当前外交上的整体性战略，但这一外交战略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适用所有方面和问题。这就需要在面临一些具体问题上适时进行调整，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可以为相应的调整提供条件。中国通过合作寻求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类新情况。特别是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与他国进行合作时，将面临一系列独特的情况，如意识形态的“歧视”、“中国崛起威胁论”的困扰等。这就需要根据这些具体的情况，适时调整我国外交战略的某些环节。这种主动的战略调整较被动的战略调整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作为正在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基本国情、面临的国际形势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选择合作安全理念，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必然性。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合作安全理念将是中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最优化选择。要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中国在具体实践合作安全理念的过程中，也应该根据时代、基本国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合作安全理念，以使其更适应变化的形势，更大程度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 宫玉涛.反思、兼容与超越——对合作安全的解析[J].外交评论，2008（6）.

[2] 宫玉涛.中国和平发展的合作安全理念研究[Z].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9.

[3] Inis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Random House,1956.

[4]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M].陈瑶华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5]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Issues（Olaf Palme, ed.）, Common Security:A Blueprint for Survival[M].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2.

[6] Nolan E.Janne,ed., Global Engagement: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M].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4.

[7] Ioannis A. Stivachti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Non-offensive Defence in the Zone of War: the Greek-Turkish and the Arab-Israeli Cases[M]. New York:Peter Lang,2001.

[8] 任晓.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4）.

[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0] 毛泽东.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A].毛泽东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1] 邓小平.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A].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双木）

·学术信息·

《权力与规范：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出版

孙霞所著《权力与规范：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一书，2010年6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影响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的因素，除市场结构和地缘政治外，作为观念性要素的认同也是关键变量。该书由此引入“地区认同”这一因素，建立起自己的分析框架，认为东北亚能源安全竞争与合作的局面是由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合作模式的构建也有赖于对这三个因素各自发展方向的制约。该书认为，影响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的三个因素——市场供求、地缘政治和地区认同，各自有两个发展方向，一共形成三对六种元素：自由竞争和政府引导、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权力政治和制度规范。这六种元素组合而成的八种结果中，只有四种能够形成合作的路径，而在这四种合作路径中，最理想的合作路径只有一种，即各国认同以制度规范的方式解决地区能源问题，并在市场供求方面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在地缘政治方面关注绝对收益。

（卷平冈）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